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学术文丛

族群空间与地域环境

中国古代巴人的历史地理
与生态人类学考察



朱圣钟 / 著

 科学出版社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07BZS037)结项成果
同时获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16SKB053)资助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学术文丛



族群空间与地域环境

中国古代巴人的历史地理与生态人类学考察

朱圣钟 /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族群空间与地域环境的视角,对曾经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古代族群巴人从历史地理学和生态人类学角度进行了考察,通过多种研究手段综合运用,复原并梳理了巴人族群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过程以及巴人时代巴地气候、植被、动物、水文、矿产资源等地理原貌及其变迁过程,并运用生态人类学相关理论阐释巴人族群地域系统内巴人族群与地域环境的作用机制,构建了动态的巴人族群生态系统模型。

本书可为巴人曾经活动区域地方政府发掘与开发巴人历史文化资源提供参考信息,对当前渝、川、陕、鄂、湘、黔毗邻地带环境整治有一定参考价值,还可为从事考古学、中国史学、历史地理学、文献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学科学习或研究的人员、高校师生等提供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族群空间与地域环境:中国古代巴人的历史地理与生态人类学考察/朱圣钟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03-059705-2

I. ①族… II. ①朱… III. ①古代民族-民族历史-研究-重庆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3181 号

责任编辑:王 媛 杨 静/责任校对:李 影

责任印制:张 伟/封面设计:黄华斌

编辑部电话:010-64011837

E-mail: yangjing@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B5

201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31 1/2

字数: 527 000

定价: 16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序

今秋八月，圣钟博士后将他新撰成完稿并确定在科学出版社印行的本书稿寄来，嘱余为之作序。这自是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尽管入秋后，需参加的学术会议较多，特别是我的一本新编论文集《历史地理学的传承与开拓》列入我院学术文库，获得学校一流学科建设基金资助后，也到了需向出版社交付“齐、清、定”稿时刻；但仍抽出时间浏览书稿，进行构思。至立冬之际，新编论文集经肖爱玲博士后帮助将电子版发往出版社后，就立即开笔撰写这篇序文，以便及时交稿。

论起为圣钟博士后学术专著写序，这已不是第一篇了。三年前的2014年9月16日，就曾为他的一部学术专著《区域经济与空间过程：土家族地区历史经济地理规律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4月）写过一篇“序”。在该“序”中，于充分论述了该书三点值得肯定与称道之学术创获后，还殷切期盼圣钟博士在该书出版问世后，再接再厉，对自己所属的民族——土家族之相关的历史地理学术问题持之以恒地开展研究，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令人十分高兴的是，在他的这本学术专著出版后仅仅两年多，他的又一本学术专著即将交付出版，同样是关于他所钟情的我国历史民族地理学领域，且是他所属的民族——土家族主要族源之一的巴人之族群空间与地域环境的研究。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他在历史地理学学术研究上用力之勤，还可看出他在这一领域理论与方法创新上下力之深！

圣钟博士后在这本新著之理论与方法创新上最突出的亮点，显然是在跨越原有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引入生态人类学的相关理论研究民族地区历史地理问题。这虽然缘于他于2015年3月至2016年3月奋力争取到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蒙古与内亚研究所访学这一难得的机会，但应该说这更得力于他在学术研究上不满足现状，并力求开拓创新的睿见卓识与勇气毅力。所以说，这本源自2007年以《中国古代巴人分布迁徙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研究》为题申请获准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后因种种客观原因，克服多重困难延至2015年初始结题，又因赴英访学，接受了人类生态学理论与方法之启迪、训



练，再将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方法熔于一炉，加以提炼锻造后，始凝铸成这一新意斐然与新见迭出的新作。尽管作为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题，作为一本学术专著出版都推迟了一段时间，但却因此获得如此意外的收获，使这一国家项目之成果与这本学术专著之学术内涵大为丰富，整体质量显著升华。由此可见，虽有所失，但也有所获，总体看来获大于失，且非纯出偶然。

前文述及圣钟博士后 2015 年春赴英国剑桥大学访学期间学习掌握了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且将之与历史地理学相结合，运用于研究我国民族地区历史地理实践，并对原已结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中国古代巴人分布迁徙与环境关系研究”重加审视，大加增补修改，且将新著名称改定为《族群空间与地域环境——中国古代巴人的历史地理与生态人类学考察》，遂推出了如今展现在读者眼前的这本新著。尽管作者自谦地说，跨越原有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对他而言是一种尝试与挑战。但通观这本新著后可以肯定，他的这一尝试是成功的！如他在引入人类学研究中已被广泛使用的“族群”概念时，就严格按照世界人类学权威专家界定的族群的四个特征，对照我国古代巴人的历史与文化，一一作了论证，论定用“族群”概念审视巴人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对“族群”具有的作为社会文化属性的“族群空间”，作者不囿于族群地理属性的三维空间，还根据历史地理学理论，加入族群历史上不同时期其地域空间又不断有所变化的动态过程这一理念，创新性提出“族群空间是一个动态的四维空间”的概念；且将之渗透进对这一课题整个的研究与撰写中。还需指出的是，这部新著中对中国古代巴人赖以生存、繁衍的地域环境，特别是唐代及其以前历史时期之生态环境进行了颇为全面充分的复原研究；还在此基础上论述巴人族群与其地域生态环境人地互动关系，提炼出巴人族群生态系统模型。这些成果不仅具有学术文化价值，且对当今巴人族群曾经聚居地区，保护生态环境与脱贫致富也具有资政借鉴意义。

总之，圣钟博士后这本新著，不仅其收集资料宏富，撰写论述严谨，观点新颖，结论明确，值得称道；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引入国外生态人类学理论、方法，与我国历史地理学理论、方法相结合，从事我国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取得这一丰硕成果，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局面，也为我国历史地理学走向世界，开辟了一个新的路径。我对之深感高兴！也因而特为之作序，并与学界同仁共鉴。

朱士光

2017 年 12 月 28 日于西安望秦书屋

前言

本书是在笔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研究报告《中国古代巴人分布迁徙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研究》（立项编号 07BZS037，结项编号 20150296）的基础上修改、增补而成的，修改后更名为《族群空间与地域环境：中国古代巴人的历史地理与生态人类学考察》。

族群概念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已有广泛使用，在英文中多表述为“Ethnic Group”，R. 纳鲁尔（R. Naroll）、弗里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界定族群概念有四个特征：（1）生物方面具有极强自我延续性；（2）共有基本的文化价值，在文化形式上公开统一；（3）构成交流和互动的领域；（4）具有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同的成员资格，以形成与其他处同样发展序列的种群不同的族类。^①巴人作为曾经活跃在中国历史大舞台上的古老族群，从最初的巴氏族，发展成以巴氏为首的巴氏、樊氏、瞿氏、相氏、郑氏五姓部落联盟，后吞并盐神部落向四周扩张，先后征服濮、賁、苴、共、奴、穰、夷、蜃等部族建立巴国，巴人群体随地域扩大而扩展，战国末年巴国覆亡后，历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至唐末五代巴人最终融入汉族、土家族等人类共同体，巴人历史发展脉络一直是连续的，清晰的。从文化上来说，巴人文化为巴人族群文化，后逐渐形成巴地域文化，统称为巴文化，如青铜文化中，典型器物有柳叶形剑、短铍弓耳矛、烟荷包式钺、虎钮鐙于，器物纹饰多有虎纹、手心纹等；考古学文化中，典型陶器有圜底釜、圜底罐、尖底罐、尖底杯、豆等，纹饰以绳纹为多；丧葬文化中，以船形棺为葬具，墓形制多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并随葬有特征明显的巴式器物；建筑文化中，以吊脚楼为主要建筑风格；音乐舞蹈文化中，巴渝舞最具特色；总体上，巴人群体具有基本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特征。在巴国时代巴国地域是巴人的主要活动地域，后巴国时代巴地仍

① R. Naroll, JWM Whiting. On Ethnic Unit Classifica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1964, Vol 5 (4): 283-312;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pp.10-11.



是巴人主要活动地域,同时伴随着巴人的迁移流徙,在迁入地形成巴人散居地,巴人地域空间扩大,而巴人聚居地和散居地是巴人日常生产的地域,同时也是巴人群体内部、巴人与其他人群交流和互动的场所。自上古时代至唐末,巴人一直作为巴人群体的专有名称而出现,这种称谓(如巴人、廩君蛮、板楯蛮等)一直带有他称的色彩,即体现了他人的族群认同,也带有巴人自我认同的印痕,可见巴人一直是被视为与其他族群有别的族群的。因此巴人群体具有族群的四个基本特征,我们用族群概念来审视巴人是没有问题的。

族群既有作为人的社会属性、文化属性,也有作为自然物的地理属性。作为社会文化属性的族群空间相对较为抽象,如族群政治空间、族群组织结构空间、族群文化空间等即属此类,是族群体实力外在影响力的一种体现,其边界相对较为模糊;作为地理属性的族群空间强调族群的产生、发展、消亡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进行的,是可以用地物界定边界的三维空间。本书所说的族群空间主要是指族群地理属性的三维空间。因为族群生存的地域空间随族群的发展壮大而日益扩展,随族群迁徙形成更多分散性族群聚居地,最后随族群的消亡而演变为历史性名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族群空间实际上就是族群分布迁徙涉及的地域空间,不同时期族群的分布迁徙地不同,族群空间及其边界也不相同,因此族群空间是一个动态的四维空间概念。巴人族群空间实际上是指历史时期巴人的分布与迁徙的地域空间,巴人族群空间的变化是巴人族群发展的一种空间动态表现形式,巴人族群空间的盈缩折射出来的实际上是巴人族群体的发展历程,本书对巴人族群研究的新视角就是通过探讨巴人族群空间变化来研究历史时期巴人族群体的发展历程。族群在发展过程中与族群居处的地域环境密不可分,本书所讨论的地域环境主要指巴人聚居地的生态环境。

开展巴人族群空间与环境关系研究也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从历史地理学与生态人类学角度探讨巴人与环境关系对深化古代族群与环境关系研究、人地关系研究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对巴人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对推动西南地区乃至中国民族历史地理研究也是有益的尝试,有助于推动历史地理学及相关学科研究的深入。其次,传统观点认为巴人最终归宿是融入土家族,土家族为巴人族群直系后裔,本书在对巴人族群起源、分布迁徙及其消亡等问题研究后指出其最终归宿有多条途径,部分融入汉人,部分融入土家族,部分融入其他族群,可更新人们对巴人最终归宿及巴人与相关族群关系的认识。最后,巴人是历史时期主要活跃在重庆、四川、陕西、湖

北、湖南、贵州等毗邻地区的古老族群，对渝、川、陕、鄂、湘、黔等地早期社会历史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部分巴人足迹还远及甘肃、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安徽、江苏、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地。但学术界对巴人起源、迁徙分布乃至族群消亡过程一直缺乏系统研究，本书一定程度上可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另外，当前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及环境整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对巴人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探讨古代族群发展与环境变化的规律，用于指导处理当前民族地区民族发展和环境协调诸问题，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可为当前部分民族生存和发展趋向提供参考，在保持族群特性的同时求得持续性健康发展。此外，巴人曾在今陕南、重庆、川东、鄂西、湘西、黔北及黔东北等地建邦立国，对上述地区社会历史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对巴人问题的研究可推动相关地域地方史研究的深入和对地方历史民族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本书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研究内容上，首次从四维时空纬度全面系统地复原了不同时段巴人的分布与迁徙状况，基本廓清巴人族群在发展过程中的地域空间及其变化历程，并对巴人族群起源、巴人族群分布与迁徙、巴国疆域及其演变、巴人最终归宿、巴人与土家族及相关民族的关系、早期巴人史料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同时首次对唐代及其以前巴人时代巴地气候、植被、动物、河流、矿产资源等环境要素进行了复原性研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唐代以前巴地环境史研究较薄弱的不足。二是提出族群空间概念，在弗里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等人族群边界概念基础上提出族群空间概念，在研究视角上力图通过探讨族群空间变化来研究历史时期巴人族群体的发展历程，将族群地域空间的变化视为族群发展变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这与以往学者们的巴人研究视角和切入点是不同的。三是从族群和生态人类学视角审视巴人族群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这在巴人及巴史研究中是一个新的尝试。四是本书在研究巴人早期历史时，尝试运用背景分析法（如对史籍成书时代、史籍版本、史籍体裁、相关史实分析），对巴史料真伪进行辨别考证，剔除不可靠史料，遵循存疑不用原则，从而避免了以往治巴史学者不考虑史料真伪，轻率下结论的弊端。五是在研究方法上多学科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主要研究方法有文献资料分析法、考古学方法、体质人类学方法、民俗学方法、民族学方法、地名学方法、语言学方法、物候学方法、孢粉分析法、地层学方法等，特别是考古材料分析和文献研究相结合，弥补了部分学者单纯从文献资料或是考古材料研究巴人问题



的缺陷；运用体质人类学材料，并结合民族学、民俗学、地名学、考古学材料综合分析，借以分析巴人及相关族群的关系。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力图复原巴人族群及其族群空间地域系统的历史原貌。

在研究时段上本书主要限定在巴人族群生存时段内，即书中所言巴人时代，其上限从石器时代始，下限至唐代末止。部分内容在涉及巴人与土家族等民族关系时可能延续到宋代，但五代及其以后时段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巴人时代范畴，因此这里需要稍作说明。

从预计社会效益来说，本书对于巴人族群分布与流徙的研究，可为巴人曾经活动区域的地方政府在巴人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开发方面提供参考信息，为地方巴人族群历史文化资源发掘与开发做出贡献。对巴地环境变迁的研究及巴人族群地域生态系统模型的构建，对当前渝、川、陕、鄂、湘、黔毗邻地带环境整治有一定参考价值，也可为地方政府制定环境规划方案和制定环境治理政策时提供参考。本书讨论的是一个历史族群，巴人发生、发展、消亡的历史发展轨迹，或许是当前我国部分少数民族正在或即将经历的历程，本书所梳理的巴人族群历史发展过程及规律或可为各级政府在制定民族后续发展战略和规划时提供参考。本书研究内容和方法上涉及考古学、中国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主要是体质人类学和生态人类学）、文献学、地名学、地理学、气候学、植物学、动物学、水文学、生态学等多种学科，因此本书对从事上述相关学科学习或研究的科研人员、高校师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可作为这些相关人员的知识性读本。

朱圣钟

于西南大学雪松书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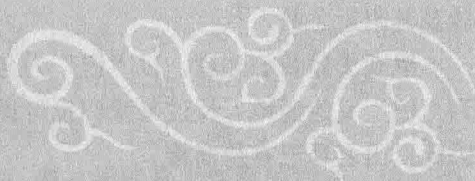
2017年8月

目 录

序	i
前言	iii
第一章 巴人族群及其地域空间	1
第一节 “巴”字义由来的争论	1
第二节 巴人族群概念的界定	9
第三节 巴人族群居住地及其地域空间	14
第二章 巴人族群起源及早期活动地域	20
第一节 巴人族群起源地争论	20
第二节 从文献记载看巴人族群起源与活动地域	27
第三节 从考古发现看巴人族群起源与活动地域	55
第三章 巴国地域及族群分布	95
第一节 巴国建立	95
第二节 巴国疆域及都城变迁	99
第三节 巴国境内族群及其分布	142
第四章 秦汉巴人族群及其分布	179
第一节 巴地政区设置与调整	179
第二节 巴地巴人族群分布	181
第三节 巴人族群外徙及其分布	193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巴人族群及其分布	206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巴地政区设置与调整	206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巴人族群分布与迁徙	218
第六章 隋唐巴人族群及其消亡	248
第一节 隋唐巴地政区设置与调整	248
第二节 巴人族群分布及汉化趋势	255
第三节 巴人族群消亡与最终归宿	262
第七章 地域环境——巴地环境及其变迁	273
第一节 巴地气候及其变迁	273
第二节 巴地植被及其变迁	283
第三节 巴地动物及其变迁	325
第四节 巴地水文状况及其变迁	372
第五节 巴地矿产资源及其开发	390
第八章 族群与地域环境——巴人族群的生态人类学分析	406
第一节 族群空间——巴人族群的地域空间	406
第二节 作为社会的人——巴人族群与其他族群的互动	411
第三节 作为自然的人——巴人族群与地域环境的互动	415
第四节 巴人族群生态系统模型	430
主要参考文献	433
附表	478
后记	492



第一章 巴人族群及其地域空间

巴人族群活动与分布的地域空间，是巴人族群体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存在形式，其地域空间的拓展与盈缩也是族群发展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历史时期巴人族群主要分布地域在渝、川、陕、鄂、湘、黔等省市及其毗邻地带，但也有部分巴人足迹远及甘肃、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安徽、江苏、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因此历史上巴人是一个活动地域广阔的古代族群。

第一节 “巴”字义由来的争论

说到巴人就涉及“巴”字含义及其由来。“巴”字出现较早，有明确记载且无争议的“巴”字最早出现于《左传》^①，其后《山海经》《竹书纪年》《逸周书》等多有记载，但均未释其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始对“巴”义进行释读，三国谯周《三巴记》、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也对“巴”义进行了解释，然诸说各异，延至今日，“巴”义释读仍是众说纷纭。

“巴”字含义目前主要有山名说、水形状说、地形说、植物名说、动物名说（蛇、虎、鱼）、石（石穴）说、生活行为说（爬山）等诸说。

一、山名说

山名说认为“巴”源自山名，但为何山又存在分歧。一说巴源自“巴遂山”，依据是《山海经·海内经》载巴国和巴遂山：“西南有巴国……后照是为巴

^① 部分学者认为商代甲骨文中有“巴”字，认为这个“巴”就是后世巴人之巴。甲骨文中是否有“巴”字还有争议，详见后文。但有明确记载且无争议的“巴”出现时间当从《左传》始。

人”，“有巴遂山，澠水出焉。”^①一说巴源自巴山山脉，巴人得名因居巴山山脉及其附近之故。^②

纵观史籍我们知道，以“巴”为名的山有很多，何独“巴遂山”“巴山”为“巴”义始源地？反过来我们也可说先有“巴”，后有“巴遂山”“巴山”。因此以山名释巴有待商榷。

二、水名及水流形状说

水名及水流形状说认为今嘉陵江、江水水流形状如巴字而得名，是“巴”义较早的说法，以三国谯周、唐李吉甫、清高士奇、近人卫聚贤等为代表。此说始见谯周《三巴记》：“阆、白二水合流，自汉中至始宁城下入武陵，曲折三回，有如巴字，亦曰巴江。经峻峡中谓之巴峡，即此水也。”^③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说：“阆、白二水东南流，曲折如‘巴’字，故谓之巴，然则巴国因水为名。”^④清高士奇《地名考略》说：“巴都累迁，江州其最初之都，江水迳其城南，三折如‘巴’字，因以名。”^⑤今人卫聚贤与高士奇持相同观点。^⑥

分析河流形状说发现，谯周、李吉甫虽都说阆、白二水曲折如“巴”字，但涉及河段不同，李吉甫所说阆水是嘉陵江上游流经阆中河段，白水为发源于甘肃临潭县西之白龙江，东南流至四川广元市昭化镇入嘉陵江；谯周所说阆、白二水与始宁城有关，始宁城在今四川省巴中与通江县间，南朝梁置，其地与嘉陵江无涉，因此阆、白二水指渠江上游支流南江及其支流，非嘉陵江上游。而高士奇所说三折如巴者为江州（今重庆市）长江水，又非谯周、李吉甫阆、白二水。纵观巴地河水曲折三回者比比皆是，奈何仅阆、白二水及江水独得巴名？因此“巴”因河流形状得名说经不起推敲。今世学者对此也有异议。^⑦

① 曾超：《“巴”义新说》，《涪陵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72—80页。

② 郑文：《巴楚关系刍议》，《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第75—81页。

③（蜀）谯周撰：《三巴记》，刘纬毅辑：《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9页。

④（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33《渝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53页。

⑤（清）高士奇撰：《春秋地名考略》卷1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17册，第7页。

⑥ 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1942年8月，第41页。

⑦ 董其祥：《涂山新考》，《巴史新考》，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78—93页；彭邦炯：《关于巴的探索》，《巴渝文化》第3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6—64页。



三、地形说

地形说认为“巴”本义为坝，依据是《广韵》中“巴”在麻韵，坝在禡韵，巴、坝同音，而“坝”从贝声，蜀人谓平川为坝，巴代表一种地形，本义为“坝”，巴人是古代居住和平坝的一种民族，巴人、濮人“居于河谷较低的地方，他们称这样的地方为灞、为浦，灞、浦就是巴或濮的对音。他们因为居在坝上，就称为巴，因为居在浦上，就称为濮”。^①

此说为解释巴义提供了一种思路，但也存在缺陷。整个西南地区山间坝子不少，不仅巴地有坝，蜀地有坝，滇、黔山地也多坝子，为何仅巴地之坝得巴名？如依此解释，广大西南地区山间坝子当均有“巴”名才合理。因此以“坝”释巴略显牵强。

四、植物名说

植物名说认为巴得名于当地所产植物“苴”，此说始自唐司马贞。《史记·张仪列传》“苴、蜀相攻击”注文引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载：“苴音巴。谓巴、蜀之夷自相攻击也。今字作‘苴’者，按巴苴是草名，今论巴，遂误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为‘巴’也。”^②苴为芦苇，四川俗称芭茅，今四川、重庆仍产芭茅，因其为巴地常见之物，遂有“巴”为“芭茅”的说法。

我们认为《史记集解》引徐广曰：“谯周曰益州‘天苴’读为‘包黎’之‘包’，音与‘巴’相近”^③，只是说“苴”与“巴”读音相近，并未说“苴”就是“巴”，到司马贞那儿成了苴就是巴，显然与谯周本义相左。而且苴为苴侯国，乃蜀属国，其王族与蜀王同宗，若以“苴”为巴，则苴侯国当为巴地，这显然与史实不合，因此以“苴”释巴臆断成分太多。

五、动物名说

动物名称说又分四种：巴为鱼说、巴为虫蛇说、巴为虎说、巴为蚕说。

（一）巴为鱼说

巴为鱼说以张勋僚、申世放为代表。张勋僚据民族语言学和民俗学材料分析，

① 徐中舒：《巴蜀文化续论》，《论巴蜀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8—137页。

②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70《张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81页。

③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70《张仪列传》，第2281页。



认为巴是我国南方壮傣语系民族中“鱼”字读音，巴即鱼。^①申世放也赞成巴为鱼说。^②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因缺乏直接的文献和考古学证据，尚难形成定论。

(二) 巴为虫蛇说

巴为虫蛇说以章太炎、吴敬恒^③、吴致华^④、陆侃如^⑤、任乃强^⑥、周集云^⑦、姜孝德^⑧、周兴茂^⑨、杨华^⑩、彭邦炯^⑪、沈长云^⑫、唐昌朴^⑬等为代表。主要依据许慎《说文解字》载：“𩇛(巴)，虫也，或曰食象它(蛇)，象形。”^⑭巴与“它”“蛇”为同类而读音互异，章太炎《文始》解释“巴盖即蟒，古音蟒如佬，借为巴”，从音韵上对巴与蟒蛇关系做出解释。也有人以蛇为巴地产物解释巴蛇关系，清何秋涛《王会篇笺释》称：“《说文》巴象蛇形，蜀训为虫，巴、蜀皆自古建国，盖因其地所有之物为名，如胸臃县^⑮因其地多胸臃虫，即以为名。”^⑯还有人认为巴作族名源自“巴”字象蛇形，读音与苗蛮

- ① 张勋僚：《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5—70页。
- ② 申世放：《巴族鱼文化》，《巴渝文化》第3辑，第223—234页。
- ③ 吴敬恒：《避巴小记》（《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1942年8月，第7页）认为巴为巨蛇，巴地多产巨蛇，故得巴名。并以荆、楚之名与其地多草木丛茂相关为例进行了类比说明，“地域之命名，或以所产房屋，或以土宜……皆有所本，巴、蜀，义取方物，其一例”。
- ④ 吴致华：《古巴蜀考略》（《史学杂志》第2期，1930年5月，第45—59页）列举巴得名因蛇说、以植物释巴、以山释巴、以水名释巴及流水形状释巴诸说后，认同以虫释巴说，认为“古代巴地多蛇”，又说“谓以巴水或巴山释巴，皆不达巴之造字原本，而以苴即巴之说，既于字之本义有乖，又行曲难达。苴、苞，皆自有本义，不得又混为巴”。
- ⑤ 陆侃如：《评卫聚贤“巴蜀文化”》（《文化先锋》第1卷第12期，1942年11月，第19页）认为巴蜀得名于蛇与蚕。
- ⑥ 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6页）称“巴”字源自巨蟒传说，并引《说文》中巴的解释，认为“巴”是巴族自称，巴族以蛇为图腾，“巴”是据图腾造形、民族称呼之声合成的。
- ⑦ 周集云：《巴族史探微》（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14、117页）称“巴是巨大而长的蛇，其体势盘曲，为象形字，与它讹音近，借为巴”，又称“先有象形巴为大蛇之名，而后才有斩杀这类大蛇、为民除害的巴人，而后才有由于血缘关系结合的巴族，而后巴族所居之域，才有巴地、巴山、巴水等等名称出现，而后才有巴山豆、巴豆、巴戟天、巴茅、巴蕉……等，不可胜数的植物名称出现，至于山、水形如巴字之说，可能更要晚一些”。
- ⑧ 姜孝德：《巴族图腾辨析》，《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第18—21页。
- ⑨ 周兴茂：《巴人、巴国与巴文化》，《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57—61页。
- ⑩ 杨华：《巴族之“巴”字涵义》，《四川文物》1994年第2期，第12—16页。
- ⑪ 彭邦炯：《关于巴的探索》，《巴渝文化》第3辑，第46—64页。
- ⑫ 沈长云：《论姬姓巴国的建立与其土著的族属等有关问题》，《巴渝文化》第3辑，第82—92页。
- ⑬ 唐昌朴：《从船棺葬俗考查巴蜀的族源》，《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5期，第51—54页。
- ⑭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41页。
- ⑮ 胸臃县，秦时置县，为胸臃县，汉代改名为胸忍县。本文除部分引文、秦代相关说法、特殊词中用胸臃县，其他地方统一表述为胸忍县。
- ⑯ （清）何秋涛撰：《王会篇笺释》卷中，《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301册，第268页。

字音相同，遂被用作巴人代称。^①近人从巴人蛇图腾入手，认为巴与蛇崇拜有关^②，依据一是《山海经》载“巴蛇食象”，童恩正引《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③，查《山海经·大荒北经》无此记载，但在《山海经·海内南经》有“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其为蛇青黄赤黑。一曰黑蛇青首”；二是认定甲骨文有巴字，并以“𪚩”“𪚪”“𪚫”“𪚬”“𪚭”“𪚮”“𪚯”“𪚰”“𪚱”“𪚲”“𪚳”等为“巴”字，并从字形上分析巴从虫，为眼镜蛇类之蝮蛇，甲骨文中的多种写法，为“巴”字象形初文。^④

也有人对巴为虫蛇说提出疑义，如陈发喜认为《山海经》说巴蛇食象，并未说巴人、巴国因此得名，许慎《说文》载“巴，虫也。或云食象它”，段玉裁注引《山海经》“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⑤。考《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⑥，只提到巴蛇，巴蛇乃巴地所产蛇，形体巨大，能食象，为巨蟒类蛇，巴蛇与巴人无关，与巴义也无关；说巴与食象蛇有关，则蛇当为巴人图腾，但文献和考古证明巴人图腾是虎而不是蛇。许慎《说文解字》首释“巴”为“虫”，其次为“食象蛇”，“巴为虫蛇说”的学者舍其首义而断其次义有欠妥当，且中国传统有称“虎”为“虫”“大虫”的习惯，以虫释巴不妥；从甲骨文到汉代小篆，一些文字字体发生了讹变，如“巴”，甲骨文中“巴”字上有人的形体，小篆中巴字为“𪚱”，已看不到人的形体，单纯从小篆字形来推测汉字的本义易导致错误^⑦，我们认为此说有理。

（三）巴为虎说

巴为虎说代表人物有彭英明、杨铭。彭英明认为“巴”为“白虎”部落“白”的转音，“巴人”就是“虎人”。^⑧杨铭认为巴人名号起源于晋陕豫方言对虎的称呼及巴人自称虎人^⑨，主要依据一是汉扬雄《方言》载“虎，或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或谓之于虺；自关东西谓之伯

① 沈长云：《论姬姓巴国的建立与其土著的族属等有关问题》，《巴渝文化》第3辑，第82—92页。

② 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第236页；彭邦炯：《关于巴的探索》，《巴渝文化》第3辑，第46—64页。

③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页。

④ 杨华：《巴族之“巴”字涵义》，《四川文物》1994年第2期，第12—16页；李干、夏淦：《卜辞中南方民族史料偶拾》，张正明主编：《楚史论丛》，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6—304页。

⑤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741页。

⑥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331页。

⑦ 陈发喜：《“巴”字本义与巴人精神通释》，《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9—13页。

⑧ 彭英明：《试论湘鄂西土家族“同源异支”——康君蛮的起源及其发展述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第12—20页。

⑨ 杨铭：《巴人源出东夷考》，《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36—50页。



都”^①，“关东西”包括今陕西、山西、河南交界地带，汉代这一带称虎为伯都；二是东汉王符《潜夫论·志氏姓》载“鍾离、运掩、菟裘、寻梁、修鱼、白寔、飞廉、密如、东灌、良、时、白、巴、公巴巴、剡、复、蒲，皆嬴姓”^②，杨铭断“巴巴公巴巴”为“巴巴公公、巴”，并以巴为巴人，而以“巴公”为地名，一为山西晋城北巴公镇，二为湖北恩施南巴公溪，并以晋南巴公镇一带为早期巴人居住地；三是从“伯都”“巴公”上古音韵分析，认为二者上古读音相近，“巴公”与“伯都”为汉以前晋陕豫一带对虎的称呼；四是巴人与先秦被称作“虎”的徐夷有关，徐人自称虎族，青铜铭文中余、涂、徐为同源字，古音同，又《方言》中江淮南楚称虎为“于𪔐”，“于”为轻音，“𪔐”为重音，急读为“𪔐”，此读法与“余”“涂”“徐”古音读法相同，徐或涂本义为虎，与巴义相同。此说与廪君巴蛮崇虎有一定关联，但巴是否为虎，目前还难形成定论，可备为一说。

（四）巴为蚕说

巴为蚕说代表人物为张文，他释巴为“蚕”，与“蜀”义同。^③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巴可能指称两种动物，如陆侃如认为巴、蜀命名与蛇、蚕相关。^④杨铭也认为巴义诸说中，以动物说论据较为充分。^⑤

六、石（石穴）说

石（石穴）说认为“巴”义指“石”“石穴”，代表人物为童恩正。^⑥主要依据一是巴族有廪君生石穴传说；二是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酉阳石耶呼石板为巴贯，重庆、川东古方言呼石为巴，由此推测巴最初含义为“石”或“石穴”；三是徐松石将巴族看作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民族，壮侗语至今还称石山为巴。由此认为巴族是因其居住环境得名，后才成为部落、民族、国家和地区名称。

此说是在确定巴族以石命名和巴族属壮侗语系民族前提下的结论，而巴族是否以石命名尚无定论，而巴族是否属壮侗语民族还有待商榷，故巴为石、

① 华学诚汇证，王智群、谢荣娥、王彩琴协编：《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37页。

②（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22页。

③ 张文：《巴蜀符号琐谈》，《四川文物》1992年第2期，第17—20页。

④ 陆侃如：《评卫聚贤“巴蜀文化”》，《文化先锋》第1卷第12期，1942年11月，第19页。

⑤ 杨铭：《巴的历史与文化研究评述（1930—1993）》，《巴渝文化》第3辑，第300—326页。

⑥ 童恩正：《古代巴蜀》，第7页。